



启蒙的后现代反思

Postmodern Reflections on Enlightenment

管小其／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启蒙的后现代反思

Postmodern Reflections on Enlightenment

管小其／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蒙的后现代主义反思 / 管小其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15-3223-7

I. ①启… II. ①管… III. ①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①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2410 号

书 名: 启蒙的后现代反思

著 者: 管小其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宋 娜

文稿校对: 刘菲桐

封面设计: 鸿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05 千

印 张: 17.75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15-3223-7

定 价: 5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启蒙反思及其后现代情境·····	1
第一章 聚焦启蒙：20 世纪学术话语·····	28
一、“启蒙”，启蒙运动：词源学梳理和术语学考识·····	28
二、启蒙研究的范式转换：20 世纪启蒙学术话语概观·····	35
第二章 启蒙：在后现代的视阈中·····	49
一、“后现代”管窥·····	49
二、后启蒙批判述略·····	56
第三章 坚守正义：利奥塔的努力·····	65
一、后现代“先锋”利奥塔·····	66
二、质疑“元叙事”：利奥塔的后现代政治话语·····	67
第四章 重申批判：福柯的旨趣·····	98
一、“后结构主义者”福柯·····	98
二、重申“批判”：福柯的启蒙再定向·····	102
第五章 解构“启蒙”：德里达的诉求·····	121
一、“解构主义之父”德里达·····	121
二、“解构”：新人文学与新启蒙·····	124
第六章 理性主义批判：罗蒂的后启蒙憧憬·····	149
一、“新实用主义者”罗蒂·····	149

二、罗蒂的启蒙理性主义批判	151
三、启蒙反思：罗蒂与哈贝马斯等人的“对话”	165
第七章 启蒙—反启蒙：思想脉向	175
一、康德的启蒙定界	178
二、哈曼的启蒙挑战	193
结 语 启蒙：康德的遗产及挑战	215
参考文献	223
附 录 20 世纪以来启蒙研究核心文献编目	238

启蒙反思及其后现代情境

对许多西方人而言，启蒙运动乃是一场能够代表西方正面形象的、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正如罗兰·N. 斯特龙伯格指出的那样，18 世纪为世界贡献了这样的观念：“人类现在和将来都会‘进步’，科学技术对推动人类进步起了最大作用，人类的目的就是享受世俗的幸福。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但大多数平民百姓可能还是信奉它们。与许多社会科学一样，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在 18 世纪孕育出来的。今天的公共政策的目标也是由启蒙运动确定的：物质福利、幸福。人们还会想到宗教宽容、人道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和社会平等。所有这些都主要源于这个世纪。更深入地看，很显然，我们的基本思维习惯以及我们的语言方式，也主要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①。而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一术语被广泛采用和现代化理论的勃兴，反思与西方理性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的现代性及启蒙便成为一个焦点性命题。^②

到了 20 世纪，人们愕然发现，“启蒙”后的、“科学进步、民主文明”的西方，带给人类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自相残杀的战争、毁灭性的“发展”、残酷的“文明”以及在过去无法想象的暴力，集中营、核武器、种族灭绝战争、奴隶制、种族隔离等，都是西方现代性施加世界之上的悲剧，这些就是现代性给我们留下的遗产^③。故此，那种一度为西方人所首肯的启蒙形象，在硬邦邦的现实面前，便有被粉碎的危险。人们不禁回想起尼采对现代性的宣判：“现代社会并非健康社会机体，而是由废物组成的病态胶合物。……现代道德、现代精神、我们的科学，

① 罗兰·N. 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6 页。

②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 页。

③ 参见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52 页。

全都是疾病的形式。”^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未退之时，两位流亡美国的犹太裔学者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道尔诺（或译阿多诺、阿多尔诺，笔者注）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轰响了“启蒙”批判的重炮，其中所探讨的“启蒙的自我毁灭”^②也一再激发人们批判启蒙的灵感，极大地推进了对于启蒙乃至现代性的反思。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后工业社会”“后信息时代”的来临，“后福特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的出现，在欧洲和北美出现了一种理论爆炸，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等纷纷掀起巨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场，其间，充满着“战争”的想象——出现了大量关于进犯、包围、交锋、突袭、反攻的谈论。知识界的风气为之大变。人们不仅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知识时代，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后现代”了！许多学者据此判断，现代主义已经死亡，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已摆脱了过去残酷压榨、展望未来同时又满腹不安的时代。即便是那些眺望知识景观、不乐见于此的后现代主义的手们，也承认一个新的棱角分明的开端。^③一种“后”时代意识逐渐凸现，“这种意识的中心体验就是理性之死亡，它似乎暗示着一个历史性规划的彻底终结，后者包括了现代性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乃至起源于希腊的整个西方文明的规划。……只要在合适的角度，人们便可以从中发现一种激进的现代性、一次对自身进行启蒙的启蒙运动、一种后理性主义理性概念的轮廓。……人们可以在‘后’思想里看到两样东西：启蒙终结的激情和启蒙极端化的激情”^④。曾几何时，以理性、文明、民主自矜的西方人，所面临的却是这些坚固之物的烟消云散！这种判断似乎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弗兰克·伦特利恰（Frank Lentricchia）、凯瑟林·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安德里亚斯·胡塞恩（Andreas Huyssen）、露丝·伊利格蕾（Luce

①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页。

②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1944/1947）”第2页。

③ Stephen Hicks, *Explaining Postmodernism: Skepticism and Socialism from Rousseau to Foucault*. New Berlin / Milwaukee: Temp, 2004, p.1.

④ 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51页。

Irigaray)等“后现代”标志性人物那里得到了验证。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北美随后波及世界的后现代主义表征着现代性的危机和内在的文化破裂。自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进入了后现代的语境。而根据大多数人的解释,“现代性”出现于15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其最充分的思想表达体现在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展望中。而随着现代性危机的充分暴露,“启蒙的问题又被郑重其事地打开。‘启蒙运动’和‘启蒙’又开始侵入学术讨论和政治讨论中”^①。美国学者詹姆斯·施密特注意到,包括理查德·罗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米歇尔·福柯等人在内的学术界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对启蒙运动提出了批评:理查德·罗蒂提议说,自由的社会应该使自己摆脱启蒙运动对“哲学基础”的惦念;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米歇尔·福柯批判启蒙运动热爱“主人式的元叙述”、敌视“他性(otherness)”^②。伯恩斯(R.M.Burns)注意到,在社会政治批评领域中有一种将现时代视为“启蒙运动”的继续或终结的倾向,其中尤以约翰·格雷为最典型。约翰·格雷借助尼采、韦伯、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阿多诺、利奥塔、麦金太尔、德里达和罗蒂来支持他的“启蒙之光已逐步黯淡”、“其自我理解也已被耗尽”因而“不再具有自身的文化效果”的判断,他认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所谓“普遍文明规划”实际上是某种“文化帝国主义”,“所谓的不同形式的人类知识,甚至是科学知识本身能够被统一成一个单一体系,并由同一种单一原则所产生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想”。它“只不过是启蒙运动中诸多迷信中的一种罢了”。格雷赞同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运动的遗产是一个由计算和意志统治的世界,它是人的理智所难理解的,并具有无目的的破坏性”的判断,认为它从根基处破坏了启蒙运动表面上的自由,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征服本质”会导致“全球范围的生态灾难”,而且它的“工具理性”会转向人自身,把人降低成为一个机器上的齿轮。格雷明显地对西方的启蒙运动表示不满,认为它实际上是“西方传统信仰与尚未形成其目标仍处于遮蔽之中的未知文化之间的中继站”,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缺乏理性或先验的基础、同时缺少那种关于世界统一性的看法的作为多元主义和瞬时性的后现代境遇,从而建立“与自然、土地及其他生物的新型关系”。^③

① 詹姆斯·施密特:《什么是启蒙?问题、情景及后果》,见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15页。

② 参见詹姆斯·施密特:《什么是启蒙?问题、情景及后果》,见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1页。

③ 参见伯恩斯、皮卡德:《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张羽佳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9页。

在研究者眼中，是后现代思想家使人们意识到，“西方文明的理性和力量一直是最发达的。这些恐怖造成的创伤和痛苦，也不是同等的。男性、白人和有钱人，手执权力之鞭，他们以牺牲妇女、少数民族和穷人为代价而残忍地使用权力”^①，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恐怖，还是现实政治的恐怖，在西方都十分突出。“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朗哥由欧洲大战的胜利者所强加给他们的国家的‘和平’所孕育一样，萨达姆·侯赛因是西方国家机构及大公司的产物。”^②足见，后现代主义批判之激烈，其反抗西方现代性文化之决绝。难怪乎，让·鲍德里亚将后现代主义描述为标示着意义的解构因而致使先前全部的社会理论过时的“第二次革命”^③。劳伦斯·卡洪（Lawrence E. Cahoone）也将后现代主义认定为“对启蒙运动、对可上溯至18世纪遗产的现代西方社会本质性原则的批评最近的一波”^④。而归根结底，“当科学与商业和军事结盟，当它被用来销售牙膏和制造炸弹，启蒙思想把科学说成是纯知识或改良社会的力量的论证也就显得可笑了。战后一代人深知科学之阴暗的一面：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广岛，科技用刑，种族大屠杀，精神病院，医学的非人性化，以及科学在使同性恋者、黑人和妇女成为病变种群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科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启蒙文化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纯洁性。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抓住的正是公众对启蒙文化若干关键性层面之幻想的日益破灭。……还是希望保留一部分启蒙主义的社会期望和价值观念的（如选择权，多元论，民主等），只不过要以一种‘后现代’的社会观来观照”^⑤。

凡此种种，都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启蒙，它究竟有何后果？启蒙与现代性有何关联？后现代主义是否真的构成对启蒙运动、现代性的颠覆与终结？其间究竟有何关联？后现代主义之启蒙、现代性批判究竟有何价值？质言之，引出了对“启蒙之后现代反思”予以进一步研究和反思这一新课题。

① Stephen Hicks, *Explaining Postmodernism: Skepticism and Socialism from Rousseau to Foucault*. New Berlin / Milwaukee: Temp, 2004, p.3.

② Stephen Hicks, *Explaining Postmodernism: Skepticism and Socialism from Rousseau to Foucault*. New Berlin / Milwaukee: Temp, 2004, p.4.

③ David R. Dickens, Andrea Fontana, and Fred Dallmayr.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Inquiry*. London: CL Press, 1994, p.3.

④ Lawrence E. Cahoone,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Blackwell philosophy anthologies, 2.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3, p.2.

⑤ 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

※

※

与西方学界对于启蒙的反思相比,国内这一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之都有一定距离。然而,正如许纪霖先生所洞见到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启蒙反思已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焦点性课题^①。相应地,在启蒙研究和启蒙反思方面,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还是对肇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并延续至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的研究,或是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的启蒙研究,均获得了大量值得瞩目的学术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启蒙反思已经具有一定的深度。譬如说,翟振明先生专就百年启蒙中的几个重大偏差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中外人文学者在对启蒙进行反思中,存在着义理与因果的混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读、法政制度建设与启蒙的虚假对立以及所谓启蒙理性高扬个人主义导致道德沦丧等几个重大偏差。在翟振明先生看来,汉语学界对启蒙的反思,基本忽视了对于西方启蒙哲学中那种义理的反思,而是一开始就进入与思想层面的启蒙运动貌似相关的政治历史事件的讨论。像杜维明所说的“启蒙心态”与现代性的关联、朱学勤等对启蒙与革命的因果关系的阐释、李泽厚等直接把(中国的)启蒙与救亡看成“双重变奏”等等,都只关注启蒙对社会历史实际上似乎起到了什么作用,很少涉及启蒙思想在学理上是否有先验的依据的根本问题。^②

然而,对“启蒙”作后现代反思,这在我国,还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毕竟,国内学术界接受后现代文化思潮、开展后现代研究也不过三十来年。曾几何时,后现代思潮初入中国便在学术界引发过激烈的抵制——对那些具有浓厚启蒙“情结”的知识分子而言,更是如此。然而,时至今日,一种便于观照的时空距离逐渐凸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后现代化”了。国际学术界重要的后现代思想家之专书及相关研究著述大量译介出版,为我国学者了解并研究“后现代”及现代性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随着研究之展开及逐渐深入,国内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者;近三十年来国内持续高涨的后现代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实现了与国际学术接轨。值得一提的是,

① 许纪霖先生指出,“反思”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特征,但在80年代,更多的是道德的反思,从启蒙思想的外部反思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体制;而在90年代,则偏重于知识的反思,反思自己的知识前提,这是启蒙思想的自我反思。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主题是启蒙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主题就转为反思启蒙。参见许纪霖、罗岗编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总论”第12页。

② 翟振明:《百年启蒙中的几个重大偏差》,见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711648&PostID=10446521。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体验了后现代的冲击并亲历知识界的严重分化,进入全球化的 21 世纪,我国学界启蒙反思的热度及国际性气质日渐凸显。这可以从我国学界发起的参与度高、影响力大的三次学术会议中见出。2005 年 12 月 15 日哈佛燕京学社协同《开放时代》《世界哲学》杂志社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了“启蒙的反思”大型学术座谈会,杜维明、黄万盛、徐友渔、秦晖、高全喜等著名学者均与会。2008 年 10 月 10 日—11 日,由北京大学哲学和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柏林自由大学哲学院协办的“理性的命运——启蒙的当代理解”学术会议在北京卧佛山庄隆重召开,与会者有来自德国、法国、美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海内外哲学、历史、德国文学等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 30 多人,充分显示了其国际性和高水准。2009 年 4 月 18 日—20 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中心,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合作,在上海和浙江南浔联合举行了一个“启蒙的遗产与反思”学术研讨会,并形成了相应的成果——《启蒙的遗产与反思》(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1 月版)。

质言之,在经过对后现代主义长期深入的研究之后,国外学术界已经开始直接面对在后现代语境下反思启蒙这样的前沿课题,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启蒙的后现代反思”作简单理解,而是努力深入其内在机理,由此进而深化对后现代主义及启蒙、现代性的理解。

相对于国外学者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步伐稍显缓慢,但是也不乏具有敏锐洞见的学者。概而观之,国内学术界对启蒙所作的后现代反思大抵有以下倾向。

第一种倾向,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启蒙之反对。应该指出,这是较为普遍的判断。我们试以姚大志先生为例说明之。

在其专著《现代之后:20 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中,姚大志先生他尝试结合启蒙、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三大主题对 20 世纪晚期西方哲学进行重新审视。姚先生认为,“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的一种反思、质疑和批判。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迅速发展和巨大进步,西方文明似乎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在胜利地向全世界进军。当代西方各界人士心安理得地享用社会发展成果并沉浸在进步和胜利的喜悦之中,但是,一些思想家开始对启蒙时代以来的这段历史进行反省,开始对支撑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方式提出疑问,开始对现代性的总体观念提出批判,并提出‘后现代’以同‘现代’相对抗,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被称为‘后现代主义’。”^①在姚大志先生看来,现在的哲学话语

^① 姚大志:《现代之后:20 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9 页。

是从启蒙开始的,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都是启蒙的产物,现代社会的整个形象是由启蒙塑造的。启蒙对于现代哲学来说意味着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一方面,启蒙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批判精神取代了迷信,打破了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启蒙使哲学取代神学占据了“王者之尊”的位置。启蒙依靠一种关于人作为主体的神话来实现关于知识的、试图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和关于实践的、希望普遍的人类解放这两个伟大的理想。但对启蒙遗产的深刻反思,对启蒙故事最彻底、最激进、最剧烈的批判则来自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的两个伟大理想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姚大志先生看到,后现代主义的突然崛起和迅速传播是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对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其著名的《后现代状况》中曾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尤为关注,并强调所谓的“元叙事”就是指启蒙关于“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放”的故事。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启蒙不仅是一个老掉牙的过时故事,而且还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故事。正是这种对启蒙故事的不信任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造反。故此,姚大志先生指出,“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启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故事,关于‘永恒真理’和‘普遍解放’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人类现在正承受着启蒙的消极遗产。”^①“后现代主义的选择是众所周知的。后现代主义者断然宣布启蒙的现代性事业是一个不可挽救的巨大失败,明确表示了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拒斥态度,并试图从文化和哲学中消除一切带有现代特性的东西。”^②

借助于利奥塔、福柯、罗蒂、海德格尔、马克思、尼采、康德等人所提供的正反面论据,姚先生指出,后现代主义要造(其要害是“霸权主义”的)“基础主义”、(其要害是“认识论主义”的)“表象主义”、(其要害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反。姚大志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启蒙持强烈批评和完全否定的态度,其结果是在其批判中结束了启蒙。在关于启蒙及其“真理理想”“解放理想”和“人的神话”等问题上,哈贝马斯则试图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后现代化主义的“相对主义”。姚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相对主义,它不仅消解了启蒙的“永恒真理”,而且也消灭了一切真理,所有事物对它而言都既无真理也无意义。而哈贝马斯反对相对主义,试图在知识领域中建立起客观性,但他认为这种客观性来自于主体间性,来自于人们经过真诚讨论所达成的“共识”,并没有诉诸传统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或客观主义。姚先生还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现在

① 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② 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页。

主义”，它从“现在”的观点来解释所有“过去的故事”。哈贝马斯则主张一种历史主义，他不是用“现在”来说明“过去”，而是强调“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对于后现代主义，启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故事，关于“永恒真理”和“普遍解放”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人类现在正承受着启蒙的消极遗产。对于哈贝马斯，启蒙则是一份包含着进步（成功）和倒退（失败）的双重遗产（故事）：启蒙所带来的理性、民主、自由、平等、科学、道德、法律、艺术是进步（成功）的，而人的“物化”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则是倒退（失败）的。哈贝马斯批评后现代主义的眼睛只盯住启蒙的负面后果，攻击一步（启蒙的失败故事），不计其余（启蒙的成功故事），既没有对启蒙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也没有认识到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无疑，在后现代主义和哈贝马斯之间，姚大志先生选择了支持后者。他还提出，为了理解哈贝马斯的启蒙判断，就必须重新考虑“什么是启蒙？”这个重要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康德作出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回答。2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启蒙。^①2005年，姚大志先生在其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后现代主义与启蒙》中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反对归根结底是启蒙批判，但从根源上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都来自启蒙。^②

细究之下，尽管姚大志先生十分精彩地揭示后现代主义对抗现代性的诸多方面，然而，他所援引利奥塔来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大抵属于误判，因为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所使用的并非名词性的“postmodernism”而是形容词性的“postmodern”。此外，姚先生的“按照康德的观点，启蒙精神的实质是理性主义”^③“在福山看来，虽然悲观主义直接来自于20世纪的社会政治危机，但其更深的根源是思想危机和精神危机。这种思想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实质是人们丧失了对‘启蒙’和‘理性’的信仰”^④诸如此类判断皆不无反对^⑤。

① 姚大志：《朝向二十一世纪的西方哲学》，参见 <http://www.tszz.com/theory/universalism/universalsim20.doc.html>。

② 姚大志：《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③ 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④ 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189页。

⑤ 用“理性主义”概括康德的启蒙思想并非合适。此外，认为福山志在坚持启蒙的观点也站不住脚，如托马斯·奥斯本所言，“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则‘认为针对相互对抗的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现在已经结束了，所剩下的无非是差异性的文化条件、习惯和传统’，‘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启蒙，而且被有效地从中释放出来了；而坚持启蒙原则就是有效地将我们自己与共产主义或极权主义的可怕力量结合起来，不论我们的本意如何’。”（见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社会理论与真理伦理学》，郑丹丹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页）。

第二种倾向，将西方学术界对于启蒙的核心关注引入中国，并推动国内的启蒙反思。

带着西方的问题意识，推动国内的启蒙反思，的确是很有意义的，这对旅美留欧的学者而言确实更为便捷，更得心应手。然而，面对启蒙这样的——不仅涉及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也关系到对启蒙以来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反思，它涉及的领域几乎包括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切方面，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在其中的——重大课题，尽管它对中国而言较之西方意义更为重要，然而缺乏全面把握和深刻反思性的学者很容易遭遇尴尬，这可从旅美学者黄万盛等人的学术遭际中见出。

杜维明、黄万盛两位先生常年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又对国内的发展非常关心，他们一直致力于在国际学术界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学术研究，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再生始终保持着充满热情而又不失理智的关心和思考。他们发现，多方面的因素合流汇总，使得启蒙的反思成为有深刻含义的思想论域。但是，他们又认为，启蒙的反思进入中国，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误解。由此决定了消除对启蒙反思的误解，使启蒙的反思在中国成为健康的现代转型所必须的思想前提，成了一个艰巨的理论工作。黄万盛先生提出，关于启蒙，除了肯定它在三百年来的近现代历史中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正视启蒙思想的困境和导致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严肃的思想任务，启蒙的反思是面向人类发展的未来必须开展的工作。所谓启蒙反思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以人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唯一准则的理性的傲慢，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工程的权威心态，以追求技术和工具理性所产生的科学的迷信，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线性的发展观、历史观，和由理性至上加技术主导所形成的迷恋规律的独断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由启蒙的地缘意识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些方面相互纠缠，形成了一套有宰制性的世界观，它突出影响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宗教以及超越世界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西方和西方以外的其他族群及文明传统的关系。所有这些是启蒙反思必须面对的基本方向。他们认为儒家公义、同情、礼治、责任等可以提供反思的向度和让人类的核心价值变得更充分、更健康的资源，希望能用从儒学角度的反思而使由启蒙生发出来的价值资源更加深化。

在2005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的“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会上，黄万盛先生等人所谓的“启蒙反思”遭到了徐友渔先生的严肃质疑：“黄万盛先生在‘对话’里面说，‘所谓启蒙反思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以人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唯一准则的理性的傲慢，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工程的

权威心态，以追求技术和工具理性所产生的科学的迷信，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线性的发展观、历史观，和由理性至上加技术主导所形成的迷恋规律的独断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由启蒙的地缘意识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我现在问，哪些人，在哪些著作里面说过这些话？这些话的上下文原意是什么？没有。他们的观点又是怎么影响了人类的社会和历史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前面那么多、那么系统、那么严厉的指控怎么能够成立？”^① 这让我们想起美国阿林顿德克萨斯大学修辞与历史话语教授汉斯·凯尔纳的感叹：“让我惊愕不已的是，当前许许多多对于启蒙运动的攻击，竟然出自于那样一些人之手，他们没有花上一个星期甚至一天的时间，来阅读 16、17 世纪的材料，来考察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某些东西何以是真实的、哪些东西是‘无须明言的’。”^②

毫无疑问，杜维明、黄万盛二位先生希望以传统儒学补救启蒙，这种思考无疑似乎是有价值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源自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对“启蒙”笼而统之的概括和指认大都缺乏足够深入的反思，因而易受批判。譬如说，翟振明先生就强调指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所谓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启蒙理性进行反思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认为，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理性，导致了对环境资源的无止境的掠夺，也导致了只顾当代人的利益和不顾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说，启蒙理性倡导人们自私自利，导致道德的全面沦丧。启蒙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在事实上导致这些现象值得讨论，但是把启蒙思想的内容作如是解释，则是绝对的错误，仅就启蒙时期被系统化的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学说的内容看，就与以上的说法南辕北辙。^③

第三种倾向，支持启蒙反思，但谨慎地看待后现代启蒙反思。

可以高全喜先生为例。高先生支持启蒙反思，但他认为，需要为它找到一个立足点，并基于中国的现实来展开探讨。在 2005 年 12 月 15 日于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的“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会上，高全喜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我们说启蒙的反思，从大的理论上说，到底反思的是哪种启蒙？启蒙中哪些东西值得反思？是基于后现代的立场反思整个启蒙之病？还是反思社会主义的启蒙或市民阶级的启蒙？此外，哪些东西还是要坚持的，甚至要继续发展的？……我们现在的制度框架，大体上是顺着社会主义这条路子过来的，启蒙中所谓的自由宪

① 杜维明等：《“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载《开放时代》2006 年第 3 期。

②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7 页。

③ 参见翟振明：《百年启蒙中的几个重大偏差》，见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711648&PostID=10446521。

政民主这条路子在中国并没有开花结果,时下文章中大量搞的是反思、批判和解构以西方的自由宪政民主为对象的这一套把戏,可这个批判的东西,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们有什么资格调用所谓后现代的思想理论来反思我们从来没有的东西呢?如果要反思的话,我看主要是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支的反思,但我不知道后现代的那些东西究竟能为我们反思这个启蒙形态提供多少有用的资源,相反,启蒙不同形态之间的张力关系,如自由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相互之间的对立性关系,或许对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问题更有启发性和建设性意义。……在西方现代社会,启蒙的现代化结果在一些方面是值得反思的,我们不能把西方各种后现代的思想理论一棍子打死,那是它们的问题,人家社会形态走到了这一步。但是对中国来说,我们是不是也要鹦鹉学舌,后现代起来?”在高全喜先生看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反思乃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现代化之前提上的,相形之下,在现代中国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批判启蒙,而是应该继续启蒙,当然对启蒙要有一个更深度的理解,即选择正确的启蒙之道。因此,“对启蒙的反思不是基于西方后现代的状况来抛弃启蒙,而是寻求新的正确的启蒙之道,鉴于中国现代问题的复杂性,基于中国当前的立场或问题意识,如果过多地提倡对启蒙的反思,乃至批判,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①我们还注意到,高全喜希望用以苏格兰为代表的启蒙范式充实启蒙,尽管与后现代主义的启蒙反思并非同道,但是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高全喜先生的这种思想倾向具有代表性,也容易理解。从根本上看,一方面,它驻足于国内当前的“启蒙”;另一方面,它对后现代主义保持警惕。当然,这些都不是我们否认对启蒙进行后现代反思的理由。

第四种倾向,深入研究后现代主义,并留意其“新启蒙”蕴涵。

这可以旅美学者王治河博士、樊美筠博士,旅欧学者高宣扬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江怡研究员为代表。

旅美学者王治河博士是我国较早地从哲学角度研究后现代思潮的青年学者,早在1993年,他就出版了《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此后他还主持编写了《全球化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与国际著名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合作主编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译丛》一套,他与夫人樊美筠博士在参与并推动全球性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运动中贡献卓著。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倡导者,王治河、樊美筠二位

① 杜维明等:《“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

博士在其新著《第二次启蒙》^①中结合中国的第一次启蒙运动，将第一次启蒙的局限性初步概括为：“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他们认为，正是第一次启蒙的上述局限导致了今日现代化之种种弊端。因此要超越现代化，实现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就有必要在反思第一次启蒙的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需要说明的是，在王治河、樊美筠二位博士看来，所谓“第二次启蒙”——也就是后现代启蒙，并非对第一次启蒙（也就是现代启蒙）的全然拒斥，而是将许多或者大多数第一次启蒙的最伟大的成就“整合起来”^②。他们尝试将之概括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重文化互补意识；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之美；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扬弃均质民主，走向道义民主；挑战霸道科学，走向厚道科学；超越纯粹理性，呼唤审美智慧。”^③

我国学者江怡研究员也从事后现代主义相关研究，在其主编的《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的“编者引言”中他提出，“我们不必在意何人被看做是‘后现代’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或刻意把某人的思想看做是属于‘后现代’的思潮，也不必担心‘后现代’这个标签可能会给某个哲学家的思想带来某种不便，因为这些思想既没有拯救西方世界，有没有毁灭这个世界。毋宁说，它们为现代社会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启蒙。”^④此后，在《后现代视野中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一文中，江怡研究员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后现代’的思想为现代社会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启蒙。这种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否定关于真实世界的一切可能的客观知识，否定语词或文本具有唯一的意义，否定人类自我的统一，否定在理性探索与政治行为、字面意义与隐晦意义、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别，甚至否定真理的可能性，总之，抛弃了近代西方文明大部分的根本思想原则。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对近现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种最新批判，是对18世纪以来的近

① 王治河博士早在2007年就提出过“第二次启蒙”，同年3月他曾以《中国的后现代化呼唤第二次启蒙》为题作了讲演。考虑到“生态启蒙”在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贝克那里主要指要有更高的环境意识，要始终对科学及其使用的领域与范围保持警惕，而没有涵盖其他领域对启蒙的反思和超越，因此，王治河、樊美筠二位博士还是倾向于用“第二次启蒙”指称对第一次启蒙的全面反思和超越。他们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其二人合著的《第二次启蒙》一书中（详见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Altizer, “A holistic, on-alienated Theologian”, in *John Cobb's Theology in Process*,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7, p.3.

③ 见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 见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编者引言”第21页。